

作家席越的新书《他们的中国》最近问世，书中关注了在中国生活的18位老外的故事。“中国的老外”是个特殊群体，从马可波罗到费正清、斯诺、基辛格，有的成了“中国通”，留下皇皇巨著；有的则成为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，不时见诸报端。

当西方遇见东方，那些来到中国的老外，如何审视这片土地？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文章，呈现一个“他们的中国”。

当西方遇见东方——“中国通”看中国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从老外那里发现一个不熟悉的中国

1965年，还在读大学的加拿大青年乔·卡特接触到了左翼思想，对毛泽东和遥远的中国产生了兴趣。20年后，已经是建筑师的乔终于来到了中国，在天津一所高校任教。此后的十年，他历经失业、没有收入来源等各种煎熬。

如今，乔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5年，尽管汉语说得比较慢，但字正腔圆。作家席越记录了乔的故事，在席越的新书《他们的中国》里，乔成为书中记录的18位外国人中的一员。

《他们的中国》中的主人公来自世界各地：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美国、巴西、以色列……他们在中国的时间长则二十年，自己的故乡

反倒成了“回不去的远方”；短则几个月，脑海中的中国印象每天都在刷新。这些老外在从事的职业也不尽相同，有的是将中国名家作品翻译介绍到母国的翻译家，有的是到中国交流访问的专家学者，有的是满怀憧憬到中国创业的热血青年。

在著名媒体人黄章晋看来，《他们的中国》一书的价值不是那些外国人在中国独特的生活经历，而在于，“从他们那里，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我们不熟悉、不了解的中国”。

当西方遇见东方，不同文化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？汉学家史景迁把西方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作

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搜罗在《大汗之国：西方眼中的中国》这本书中。《大汗之国》就像是一面“西洋镜”，透过它，我们可以看到八百年以来西方人对中国的记录与幻想、洞察与偏见。从蒙元时期的鲁伯克修士、马可波罗，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、基辛格，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，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，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。

史景迁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，擅长用独特的视角和笔法讲述中国。他的重要著作《追寻现代中国》历述明末到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，同时论及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，出版后畅销欧美。

西方记者将“红色中国”推向世界

近代中国特别是共产党和红军为世人所知晓，与一批关注中国革命的西方记者密切相关。其中最著名的非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莫属。他的代表作《西行漫记》（又译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）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巨大，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读物。

1936年6月至10月，斯诺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考察，他的所见所闻日后被他写进书里。1937年10月，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，随即引发轰动。次年2月，该书的中文版在上海出版，彼时抗战已经开始，考虑到国共合作等因素，书名改为《西行漫记》。

如《西行漫记》所描述的，当时红军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。“在世界各国中，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更大的谜、更混乱的传说了……有些人否认红军

的存在，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。”斯诺在书的开篇中罗列了众多关于红军的问题：“中国的红军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，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，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？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，为反对帝国主义，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。南京却说，红军不过是由‘土匪’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。究竟谁是谁非？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？”

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，并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。斯诺在书中解释了共产党在西北受到群众拥护的原因，不是“各尽其能，各取所需”，而是实施了类似孙中山的主张“耕者有其田”，“对农民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：重新分配土地，取消高利贷，取消苛

捐杂税，消灭特权阶级”。

《西行漫记》问世后，许多年轻人受此影响，对红色沃土心生向往，一批批赶赴延安。毛泽东为此曾评价说：“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。”

与斯诺同时期的另外两位记者史沫特莱和斯特朗，同样将视线投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。史沫特莱留下了《中国红军在前进》、《中国人民的命运》、《中国在反击》、《中国的战歌》等专著，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革命战争。斯特朗则第一个报道了“皖南事变”的真相，毛泽东的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论断，正是通过她发表的。斯特朗的《中国人征服了中国》一书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她在延安等地的经历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斯特朗相继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，并终老中国。

中国转型期的解决方案是“中国通”的观察焦点

如果说斯诺、史沫特莱、斯特朗对中国革命充满热情，那么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观察则更为理性。如哈佛大学教授、《邓小平时代》作者傅高义所说，学者的工作是客观地提出看法，“也要批评”。

有“头号中国通”之称的费正清著有十多部中国研究书籍，《美国与中国》介绍了中国早期历史、近代革命史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。在他的传记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》中，他以自己的观察回答了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、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等问题，对现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进行了解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与西方世界基本断了联系，关于中国的一手资料难以获得，这导致西方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异常艰难。对这些学者冲击更大的是，受二战后麦卡锡主义的影

响，费正清因被认为有“亲共倾向”而被批评并接受调查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中国国门初开。傅高义于1987年受邀来到广东做研究。在7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去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。两年后，傅高义推出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一书，这也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。该书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、性质、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。正是在这个时期，傅高义已经着手准备写作《邓小平时代》的资料。

“中国通”们也及时关注中国的变化。哈佛教授特里尔较早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。上世纪80年代，特里尔的书《毛泽东传》在中国出版后，广受追捧。3年前，特里尔的《我与中国》问世。这本书涉及的人物上至国家领导人、文化名流，下至工人、农

民、普通知识分子。有评论认为，特里尔将视线从领袖人物转向中国普通群众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思考，即“什么在孕育中国转型期的解决方案”，特里尔的结论是“活跃的社会氛围、市场经济、自由流动的思想”，而不仅是“明智的政治领导人”。

另一位著名的“中国通”，被称作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”的基辛格去年10月也推出新著《论中国》。该书是这位美国前国务卿首部中国问题专著。基辛格分析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传统，从围棋文化与孙子兵法中探寻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模式，试图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决策机制，以及对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政策、抗美援朝、中美建交、三次台海危机等重大外交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深度解读。

两位哲学家对中国的思考更加令国人思考

与这些“中国通”相比，90多年前西方两位著名哲学家的中国之行如今很少被人提及。

1919年4月，美国著名哲学家、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杜威应邀访华，一年之后，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来到中国讲学。对当时的中国，杜威有这样的评论：“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。所谓‘民国’，只是一个笑话。可是，在某些地方，又比我们

更民主些。这里有完全的社会平等，但妇女除外。议会，十足地是个滑稽剧，但自动自发的舆论，却有异常的影响力。”

罗素在华的演讲后来被集结成书出版，书名叫《中国问题》。在书中，罗素对中国人的性格缺点进行了直接阐述，将其归纳为三点：贪婪、怯懦、冷漠。

学者童世骏在一篇介绍此书

的文章中说：“在罗素看来，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，那就是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。中国如果能一方面保存文雅、谦让、正直、和气等特性，同时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，就可以发展出‘一种较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更加优秀的文化’。”这些观点读来有振聋发聩之感，更加令国人思考。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他们的中国》
席越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本书记录了在北京、上海生活的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图景。



《大汗之国：西方眼中的中国》
史景迁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这不只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文化刺激与响应的书。



《西行漫记》
埃德加·斯诺 著
东方出版社
本书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，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。



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》
费正清 著
中信出版社
一部个人化的现代中国史，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。



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
傅高义 著
广东人民出版社
本书考察了1978年—1988年十年间在改革前沿广东所发生和开创的重大事件。



《中国问题》
罗素 著
经济科学出版社
本书集中了这位“世纪智者”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思考。